



史學叢書系列 68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 與知識份子

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

李仁淵 著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
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

李仁淵◎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
為中心的討論 / 李仁淵著. --初版. --臺北縣
板橋市：稻鄉，民 9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986-7862-77-5（平裝）

1. 報業－中國－晚清（1840-1911）

898.09

94020204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
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

著 者：李仁淵

出 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美原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40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I S B N：986-7862-77-5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本書是我在 2002 年通過的碩士論文。在此論文中，我試圖探究晚清傳播媒介與思想、政治、社會之間互動的問題。這是一個龐大而太過野心的計畫，本論文只能針對某些特定的層面做初步而概括的論斷。作為初試之作，本文或許有不少不夠成熟周全的描述、過於莽撞輕忽的推測，或者在資料上有所不足。此外關於傳播與出版的歷史研究近年來蓬勃發展，在與本論文時段重疊或相關的研究，如 Christopher Reed 與 Barbara Mittler 的專書，Bryna Goodman、Natascha Vittinghoff 等人的論文，都是本書所未及參考的。這些缺失尚請讀者包涵，且不吝賜教。

本書在許多人的協助與指導之下完成，在此衷心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王汎森先生開啓我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興趣，每次與老師的談話給我在智識上很大的刺激，本書的許多觀點便是直接間接接受王老師的啓發而來。王老師學問上開放而謹慎的態度更讓我獲益匪淺，這些是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我的兩位口試委員，李孝悌先生與黃克武先生，均對這本論文形成有很大的影響。本書的基礎很大一部份是受益於李老師先前的著作，另一點或許李老師也不知道的是，當我仍是大學生時曾在史語所的營隊中聽了李老師關於歷史敘述的演講、讀了 Simon Schama 與 Eugen Weber 的文章，這讓我日後對歷史寫作的問題更加重視。在研究所一年級暑假，則在黃克武老師的指導下讀了一系列中英文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著作。黃老師不吝在百忙中抽出那麼多的時間指導一個初出茅廬的研究生，不僅令我在學問上有很大的進展，黃老師嚴謹細心的研究態度尤其讓我

有很大的收穫。

就讀七年的台大歷史系是奠定我求學基礎的地方，許多師長的教導讓我深深感佩。在林維紅老師的課堂上學到治學的根本工具與觀念，林老師在教學上的熱誠用心是學生們的幸福。在楊肅獻老師與王世宗老師西洋史課堂上的收穫，讓我回頭看中國史研究時可有更多觸發，尤其是楊肅獻老師課堂上所引介 Robert Darnton 與 Roger Chartier 的著作，則是我論文胎成之時的靈感來源。

本文成形之際幸有許多同儕得以討論。孫慧敏學姊、林志宏學長、陳思宇學長提供我不少寶貴意見及鼓勵；夏克勤、張遠、王飛仙等同學們讓我在台大求學過程中接受到更多刺激，有更多成長的機會。另外有許多朋友，雖然我沒列出你們的名字，但我對你們的感激之意只會更多。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我的父母，無論是經濟上、生活上、情感上，都給予我最大的支援。

李仁淵 2005.07.14 基隆

目次

自序.....	I
序論.....	1
第一章 1895 年之前新式傳播工具的引入	21
第二章 傳播媒體的政治化	97
第三章 從海外到國內	153
第四章 從租界到內地	213
第五章 官方的回應	289
第六章 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江南為例	339
結論.....	365
參考書目.....	379

圖表目錄

表 1-1：1895 年之前傳教士與中文傳播事業	48
表 1-2：1895 年以前各地最早報刊創辦年份比較	57
表 1-3：《申報》銷量與分銷處演進表(1872-1887)	68
表 2-1：1893-1898 年廣學會書籍銷售金額（洋銀圓）	104
表 2-2：1815-1911 年間各時段平均每年中文期刊創刊數	105
表 2-3：《時務報》收支簡表（單位：洋元）	124
表 2-4：《時務報》捐款者身份統計	125
表 2-5：《時務報》各地代收捐款點與主理人	125
表 2-6：各地方官員飭札購《時務報》表	128
表 2-7：《時務報》各區域派報處個數表	130
表 3-1：留日學生期刊與相關團體一覽	202
表 3-2：1900-1904 年主要留學生刊物中國經銷處一覽	206
表 3-3：1903-1905 報界調查總表	207
表 4-1：上海、海外、港澳三區發行之中文報刊數與比率	214
表 4-2：1815-1911 年間分區中文報刊創刊數（種）	262
表 4-3：1815-1911 年間分區中文報刊每年平均創刊數(種/年)	263
表 4-4：1815-1911 年間各區中文報刊創刊比率（%）	263
表 4-5：維新後各城鎮第一份國人自辦白話報刊創辦年	264
表 4-6：《俄事警聞》徵文所限定語言	265
表 5-1：1896-1911 年每年中文報刊創刊數	295
表 5-2：1896-1911 年中國內地中文期刊創刊數比例	296
表 5-3：1903-1905 年報業調查主要報刊讀者群分類與屬性表	303

序論

二十多年前起，各式各樣的媒體都告訴我們，「資訊爆炸」的時代已經來臨。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從網際網路、衛星直播、二十四小時放送的電視節目，以及定時出版各種一般與專業性的期刊中，我們可以輕易獲知中東戰局、美股行情、國會新聞、學界動態，乃至於日本新近流行的手機款式等訊息。不必經由面對面的接觸與口語討論，我們同時與一大群人關心政治人物新發表的言論、新上映的電影卡司，以及接二連三爆發的各種社會醜聞。最新的觀念、話題、思潮爭先恐後進出我們的眼耳腦筋，如今我們要擔心的是不被無用的話題掩埋，從一大堆不得不接受的垃圾資訊中，看看是否能遇到些有用的滓渣。

個人的眼耳在資訊網絡中延伸拓展，通往腦袋之視聽工作由各種利益衝突下的社會機制代勞，左右個人與群體的思考方向。並不是說作為行動者的個人在噪音龐大的機器運轉聲中失去判斷能力，而是蜂湧進來的資訊決定或限制了我們據以下判斷的材料，每個個人都不得不與各種複雜的社會機制產生關係，研究機構透過媒體片面節選的報導決定什麼該吃、什麼不該吃；政黨透過電視廣告左右選民投票的意向；財團無孔不入地隔空說服消費者購買他們的商品。登門拜訪的里長、同事間閒話式的產品比對或評鑑等面對面的溝通方式仍有其效力，然而溯及其內容與影響範圍，已不能與威力強大的新式傳播媒體相比。

同時從上個世紀開始，各式各樣傳播工具開發的技術日新月異，從期刊、電影、廣播、電視到網際網路，傳播的範圍越來越廣，

2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

資訊越來越即時、流通速度越來越快，人群關係也隨之產生變化。每當一種新工具在社會中開始發揮什麼效果時，總有人給予滿懷的希望，期待它能達到全面性的建設或顛覆效果。如同上世紀初的人這樣期望：「二十世紀以前，槍礮之世界也；二十世紀以後，報館之世界也。」¹然如今報館逐漸沒落，而槍砲日新月異。最近的例子是對於網際網路的期待，許多抱持不同意圖、不同理想的人，認為可在其中建立一個突破現有格局的烏托邦，讓邊緣的、無權的人翻身。一種新的傳播工具發揮影響力之始，的確可以在各種權力嚴密交鋒覆蓋的罅隙中達成部分顛覆的效果，然而各種新領域的創成也從不是憑空築成的空中樓閣，不可能不從既成各種權力機制——包括文化上的與物質上的——中尋求滋長養分（如果累積夠了成長的資本的話），早期發揮顛覆功效的微小領域難保不在擴展中成為既有勢力反噬並加強其宰制形勢的機會，如同在網路空間中英文的獨霸甚於實際社會，以致於要在其中發展其文化獨特性前先得融入一普同性極高的應用工具；而網路管線鋪設的高成本唯有政府與財團負擔得起，不僅國家間的差異擴大，在國內若要擴展網路勢力也必須要面對政府與財團的監控。

一百餘年前，當西方的傳播工具隨著中西之間越來越密切的來往進入中國時，國勢飄搖下更多人對媒體的功效期望深厚。究之近代中國的變遷轉化，不可避免的主題之一是西洋思想、制度與技術的輸入。無論是精神或物質文化，欲擴大影響力，均需透過媒體的

¹ 這句來自西方的話被廣泛引用，見〈論報館之有益於國〉，《新聞報》1905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轉引自《東方雜誌》2.4（1905），57。類似的意思如：「歐洲人之言曰：二十世紀以後，報章政治之世界。」〈論政府宜利用報館并推廣白話演說〉，《順天時報》1905年，轉錄自《東方雜誌》2.8（1905），169。

傳播；然而傳播媒體除了是文化的載體以外，其本身亦是文化的一部份。在傳入西方訊息時，除了訊息的內容以外，訊息傳播之形式亦衝擊原有的文化預設，改變了各階層與社會各機制的關係。假使有更多人可以透過傳播媒體接受各種知識，甚至有能運用此知識理性或非理性地批判現實，原先壟斷知識與權力的特權階級，是否還能維持跟以往一樣優越的支配地位？

Raymond Williams 認為近代西方經歷了三種長期的革命：政治上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革命、經濟上的工業革命，以及文化上知識與訊息傳播的革命，²而此三項革命又彼此關聯。各種傳播形式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對思想、政治，乃至文化的影響，從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逐漸成為歷史學家與社會理論家討論的課題。Elizabeth Eisenstein 的名著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點出印刷術之應用在宗教改革、科學革命、文藝復興等歷史變遷中的關鍵地位，名之為「印刷革命」。³雖然這個「革命」是否過於被誇大、印刷之應用是否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近來屢被重新討論，⁴然而開啓英美學界關

²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³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⁴ Adrian Johns 對此「革命」的重估與 Eisenstein 的回應見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的論壇 "How Revolutionary Was the Print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1(2002.2), 84-128。又 Robert Darnton 在 1999 年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演說中發表的 "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指出許多時代都有資訊過多的說法，且資訊流通的方式非常複雜。訊息在各種併陳的形式間流傳、在不同形式間交換，不僅經由印刷。Darnton

於「書籍史」、印刷與傳播的注意。而在法國，「書籍史」的傳統還要久些。Daniel Mornet 在戰前就有關於法國大革命前書籍流通的研究，主張史家不僅要研究偉大作者與作品，而更要掌握一個時代整體的「文書製作」(literary production)；不只要研究文本，還要究及文學機構、作品流通與讀者群。⁵此將以往著重於非歷史之文本批評的取向轉移至文本生產與流通機制的分析，在 80 年代之後與新文化史契合，Roger Chartier、Robert Darnton 等人為其中代表人物。⁶他們對於十八世紀法國的研究，從大思想家與正典，延伸到讀者群、官方檢查系統、禁書與色情刊物、書商與文化掮客、溝渠之間的下層知識份子等，不僅改變了法國大革命前的歷史圖像，更引領後繼

雖未直接評論印刷出版品的重要性是否被高估，但似乎呼籲要更注重各種不同形式之間的互動關係，不僅限於慣用的印刷品。Robert Darnton, "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1(2000), 1-35.

⁵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Lydia G. Cochra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9. Mornet 在 1933 時的著作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1715-1787* 為其代表著作。稍晚的另一位史家 Lucien Febvre 關於書籍印刷、製造、流通史的著作計劃，後來由 Henri-Jean Martin 完成，然此要著要遲至 1987 年方有英譯本。見 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trans. David Gerard (London: Verso, 1990).

⁶ 如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Encyclopedia, 1775-180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79);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W.W. Norton, 1995); Robert Darnton,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者去思考一些問題：去除後世的神話創造與重建，如今所珍視、強調的啓蒙理想是以什麼樣的管道傳遞到群眾心中？啓蒙運動對法國大革命、上層文化思想對集體政治行動，有什麼樣的影響，怎麼樣能影響？知識（*savoir*）如何產生與運作，與權力（*pouvoir*）之間的關聯為何？

與史家書籍史取向有別，但同樣是討論訊息傳播對社會之影響的是社會理論學家對歷史趨勢之研究。Jürgen Habermas 與 Benedict Anderson 是現今最常被引用的範例。⁷Habermas 認為近世歐洲在啓蒙時代中後期，由資產階級的報刊、俱樂部、咖啡廳等各種文化機構中形成一種中產階級的公共領域，讓群眾在官方權力以外，公開的使用理性批判政治威權。Anderson 則以報紙、小說、教育體系等機構作為國族共同體想像之憑藉，從印刷資本主義當中，人們得以在宗教與專制王權以外，想像一種新的人群關係、一種想像的、有限的、具有主權的民族共同體。而這種共同體的概念又隨著帝國主義與各種傳播模式的移植，擴散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此二人終極關懷的對象不同（自由主義批評空間的興衰與民族主義國際社會的未來），但不約而同的以訊息傳播模式作為歷史發展的關鍵點之一。在 Habermas 的架構中，各種由

⁷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中譯：哈伯瑪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1983])；中譯：班納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新聞史家對上述二人的評述見 Michael Schudson, “News, Public, N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2 (2002.4), 482-486.

資本主義興起的訊息傳播模式不在政治勢力統攝之下、以較自由平等的方式運作，是資產階級據以發揮理性、批判專制政權的憑藉所在；而 Anderson 則注意這些與資本主義結合的傳播媒體，在聚合群眾情感與想像、重新定位群我關係的功能。他們共同的預設是將訊息傳播的機制放在社會關係下，從其與各群體、各機制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看它們在歷史發展中產生的作用。他們對於訊息傳播的看法顯然是較為動態的（dynamic）。訊息傳播的模式一方面受各種社會機制的影響（如資本主義市場、官方禁制與推動、新科技的發現與運用），而不停變動；另一方面也影響到社會上各群體的互動關係。

Habermas 與 Anderson 的取向開啓許多研究方向，如：媒體與政治、公私領域與政治權力、文化想像與社會機制的關係等等，然而也拋出不少問題。Habermas 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旨在分析近世西歐，除了理論內部的檢討、重估與伸引外，⁸引起的問題是，同樣的模式可否適用於其他時空的社會（如殖民時期前後的北美、明治時期的日本等）？或者以之來評估其他社會可以比較出什麼樣的普同性或獨特性？不同於 Habermas 主要在分析西歐社會，Anderson 嘗試以精簡的篇幅對近現代、全球的發展提供一個宏觀卻又照應各種不同型態的解釋架構，因此從 Anderson 的理論中延伸出來的問題是，在其

⁸ 加入性別的因素重新檢視「公共領域」的著名作品有 Joan B.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前者注意到法國大革命時期中產階級公共領域對於女性的排除，後者提出啓蒙時代女性在公共領域形成中扮演的角色。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這本論文集則是全面性的從各方面重估公共領域的概念，並有 Habermas 本人的回應。

現代性的預設底下，作為傳播之受眾的非西方「國家」，是如何地接受並採納其民族概念，與相伴之傳播模式？他們的主動性何在，新舊衝突之際如何吸納、挪用民族論述？面對西方的民族論述，非西方「國家」豈真是難以逃遁？⁹這些提問同樣也可以用來反省十九世紀中末期以來，西洋的傳播工具大量進入中國所產生的影響。

對於中國近代訊息傳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聞史或報刊史的範疇上。戈公振民國初年的《中國報學史》因為是開山之作，至今仍常被引用。¹⁰戈著的優點是因為戈公振從晚清以來任職報界，曾在《時報》等報館中任校對、編輯，因此部分述敘可說是當事人言，且距

⁹ Partha Chatterjee,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Mapping the Nation*,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Verso, 1996), 214-225; Prasenjit Duara, "Introduction,"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3-16. 簡而言之，站在後殖民者的立場，如果我們按照主流的「西方」的民族論述對歷史或社會進行理論性的操作時，是否我們便順從了現行的壓迫性的權力關係，進一步鞏固了主流論述，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性，尤其是被殖民者的能動性？如 Duara 提出，西方的民族理論學家（如 Karl Deutsch）很早就將印刷、傳播與民族主義的形成結合起來，然而在民族認同藉由傳播科技鞏固的同時，其他各種認同，如性別、性向、階級、宗教，乃至民族框架難以定位的少數族裔（如塞爾特人、布列頓人、亞裔美人）等，不也利用同樣的工具營造其想像性的認同，何以只有民族成為「想像的共同體」？如果我們忽略這些部分，依循民族論述的邏輯操作，豈不是在論述上重製(reproduce)並鞏固了西方與非西方在全球、國際社會中不平等的權力位置（一如早期民族理論學家以西歐的模式評估，認為非洲、亞洲等「發展中的」民族國家是偏離的、不成熟的體制，然而在現行不平等的國際社會秩序以及既定的歷史事實中，這些國家當然不可能重複西方民族國家形成的「程序」，於是這些國家永遠只能是和西方典範比較下的「缺憾」），以及「國」內層次上，國家對於個人的壓迫與控制？

¹⁰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離晚清較近，保留許多當時的資料。然而時人的優點也同時是缺點，儘管是當時人，仍不可能看清時代的全貌，後世史家對史料的挖掘與考證，修補了戈著中許多記載失實的地方，然而戈公振的許多觀點，以及分類架構，仍長時期被海峽兩岸的新聞史、報刊史著作沿用。

1949 年之後兩岸新聞史、報刊史除繼續收集、挖掘報刊史料外，¹¹綜合性著作最著名者當屬方漢奇所著之《中國近代報刊史》¹²，而其後由方漢奇主編的《中國近代新聞事業通史》¹³可說是綜合近年來報刊史研究的成果。兩岸報刊史共同使用的是「洋務運動—維新運動—革命預備（或立憲運動）—辛亥革命時期—民國初年」的敘述框架，以政治目的（革命或維新）與階級（如封建舊官僚與資產階級革命派）作為分期、分節的判準。¹⁴這種敘述方式容易流於片面，以後世觀點臆測的政治意圖來區分各種出版品的性質，而忽略了其形式、資金、對象等更基本的差異，或者牽涉於報刊出版內外更複雜的社會關係。例如將《時務報》與《清議報》都視為是維新報刊，但忽略了海外與國內、流通方式、支持者與出資者等關鍵性的差異。又如《時報》由於創辦之始有康梁出資，因此很片面地被歸於立憲

¹¹ 如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7）；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等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¹²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1981]）。

¹³ 方漢奇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¹⁴ 除上述諸書以外，1949 年以後兩岸重要新聞報刊通史著作有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6）；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台北：三民書局，1978）；劉家林，《中國新聞通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等等。

派的刊物，然而《時報》本身各成員的政治主張未必一致、未必未變，甚至未必有清楚的政治主張，尤其在編輯的約束性不那麼強的情況下，難將報紙本身直接當成是某種政治立場的呈現，更遑論《時報》本身具有之商業性，與其背後複雜的人際網絡。其次，政治目的的不明確的出版品被低估，或者排除在外，並且高估政治刊物的影響力，扭曲當時的出版圖像。如銷量更大的商業報刊、以啓蒙爲目的的白話報、各種小報等，便缺乏相應的討論；而銷量很少、僅出刊幾次，甚至未出刊的革命宣傳刊物，卻佔有相當大的篇幅。政治性明確與不明確的刊物未必一定要分開討論，它們代表的常是同一種現象，在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上的展現。當然，每一種分類的標準，爲配合整體論說的趨向，必然在其他範疇上有所省略，然而指出分類準則的限制，以及分類之間的曖昧性仍是必須的。

在報刊、新聞史以外，張靜廬早期所編的出版史料集至今仍有相當的參考價值。¹⁵近期來新夏接續古代圖書史研究主編的《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綜合「書史、目錄學史、圖書館史」的企圖值得注意，然而尚須要更齊一的觀點統整。¹⁶在技術上，關於印刷的綜合性論著甚多，近年來以《中華印刷通史》規模最大、收集最完整。¹⁷此外，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則有很大一部份在處理西

¹⁵ 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張靜廬編，《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至丁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1959）。

¹⁶ 來新夏等著，《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¹⁷ 簡體版：張樹棟等著，《中華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9）；繁體版張樹棟等著，《中華印刷通史》（台北：印刷傳播基金會，1998）；網路版：

<http://www.cgan.com/book/books/print/g-history/index.htm>

方概念如何藉者出版與翻譯對晚清的知識文化產生影響，對晚清中西交流有詳概的引介。¹⁸然而大體而言，關於文字傳播、掌握時代整體「文書製作」的專著尚不多見。以論文而言，李歐梵與 Andrew J. Nathan 合著的“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認為 1895 年之後出版業的發展使大眾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產生很大的變化，尤其從政治與文化的觀點來看報紙與小說等大眾傳播媒體在清末的作用，提出不少值得參考的論點，是較早整體地討論晚清訊息傳播之社會效應的論文。¹⁹桑兵〈論清末民初傳播業的民間化〉一文認為晚清時期傳播業最重要的趨勢是主導者與受眾從官方轉向民間，傳播業民間化的結果主要有三：1.打破封建正統文化的壟斷，促進各種社會思潮公開並存競爭，而使知識群體擺脫對皇權官府的依附狀態；2.改變民眾集體行動的行為方式，加快並擴大愛國民主運動的頻率與規模；3.破除專制統治的神秘性，形成社會制衡力。²⁰這篇短文理出傳播業民間化之下官、商、紳、民之間關係變化之趨向，許多觀察很有見地，留下很多可進一步探究的線索。

針對單一傳播機構或傳播形式的研究已累積一定成果，但也都有待拓展的空間，例如關於民間商業出版機構的討論幾乎都集中在

¹⁸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¹⁹ Leo Ou-fan Lee,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60-398.

²⁰ 桑兵，〈論清末民初傳播業的民間化〉，《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胡偉希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236-252。